

丧失了名誉的 卡塔琳娜·勃罗姆

海因里希·伯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丧失了名誉的
卡塔琳娜·勃罗姆

又名

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

〔西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孙凤城 孙坤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7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4}$ 插页 2

1977年6月北京第1版 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29

定价 0.43 元

译 者 序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是西德资产阶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1974年写的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在西方文坛受到好评，立刻成为畅销书，第一版印了十万册。德国小丛书出版社至1976年3月再版了四次，印刷了二十五万册。1975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后，更在西欧引起注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文学，各种倾向，各种流派非常复杂，发展很不稳定。但从这些流派本身，特别是通过它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战后西德历史发展的一个概貌。在这些作品中，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三十多年的社会生活，诸如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的萧条岁月，五十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战争的谴责，法西斯分子的蠢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在有些作品中，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同德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把德意志民族的历次灾难同个人悲剧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德国社会的认识。与此同时，各种流派的作家塑造了许多不同阶级、

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刻划了他们在这个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各不同的精神境界。

海因里希·伯尔就是这些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战后西德的历史。他站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立场上，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写出了一系列反对战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作品。

海因里希·伯尔于1917年出生在科隆，是一个天主教徒。父亲是雕刻匠。伯尔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当过学徒。1939年在科隆学习过文学，此后便被法西斯德国征兵入伍，在部队中经历了六年的战争生活。战争快结束时，他曾在法国的美国战俘集中营待了几个月。他的作品《火车正点》(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等都是以这次战争为题材。在这些作品里表达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伯尔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对战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然，他不可能分清战争的性质，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战争是无聊的”，这是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战后，伯尔当过木匠和统计员，接触了大量的下层人民，因而，从五十年代起，他的作品中描绘的社会面比以前宽阔得多。在他的笔下，有上层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更多的是小职员、小商贩、穷教员、杂耍演员、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等人物。伯尔

细致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所谓的“小人物”，描述了他们在西德战后“经济奇迹”中的生活遭遇，他们在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精神上的徬徨苦闷。他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有长篇《……一声没吭》（1953）、《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的看法》（1963）等。

伯尔的艺术手法，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同时也采用了一些现代派艺术手法。因此，他在当今西方文坛上很负盛名。西德把他称为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性作家，说“他的经过考验的成就，已经超出了专门文学爱好者的范围和德国的国界。”他的小说在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日本、波兰和苏联等国均有多种译本。英美批评家称他是当代德国文学中的歌德。1971年伯尔的长篇小说《和一个妇女的合影》发表，这部小说通过二次大战后一个妇女所接触的人物，描写了战后德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被誉之谓“欧洲之书”。1972年伯尔获得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金文学奖。在授奖证书上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杰出技巧结合起来，因此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伯尔还是一个多产作家，他除了写长、短篇小说外，还写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文学论著，以及翻译英语作品。

伯尔当然不能从阶级的观点来观察西德的社会现

实，但他对战后西德几十年的社会历史演变作了生动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大胆的尖锐辛辣的讽刺，比较深刻地剖析了这个社会的“脓疮”，并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他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西德社会的现状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是伯尔1974年的作品，小说的情节讲的是一个年轻正派的家庭助理员遭到黄色报纸的诽谤，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开枪打死了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记者。这部作品1974年由西德《明镜》周刊首次连载发表，并以《伯尔的〈日报〉故事：“现在就蹦吧！”》为标题撰文说明了伯尔写这部小说的背景。文章说，1971年由于在西德某地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西德有影响的报纸《画报》指控犯罪者是巴德尔——曼霍夫匪帮，而伯尔曾发表文章认为这种指责毫无证据，于是立即激起了《画报》对他的攻击，因而次年在搜查巴德尔匪帮时，伯尔及其儿子的住宅都遭到了警察局的搜查。这篇文章指出，伯尔由于有这样的经历，因此在《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一书中，将“过去受到新闻界的迫害，以小说的形式写到了他的作品中去”。小说中对《画报》的讽刺挖苦是非常明显的，作者强烈地抨击了这类热衷于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专门残害别人名声，以致迫使当事者家破人亡的低级新闻报纸，从中对西德政治经济界、文化新闻界中

的头面人物，以及政法机构中见不得人的卑劣行径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作者以女主人公卡特琳娜·勃罗姆的遭遇作为对比，深刻描绘了上层阶级人物的丑恶灵魂。

伯尔的这篇小说跟他的许多别的作品一样，取材于日常生活琐事。主人公是个普普通通的出身于矿工家庭的助理员，虽然她与伯尔笔下所塑造的大部分“小人物”一样，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感到“孤独”和“寂寞”，但却不同于他们那样只具有忍耐、百依百顺的软弱性格；相反，她勤劳，诚实，正派，个性很强，她讨厌周围的庸俗环境，她不受在经济界、学术界颇有地位的斯特劳布莱德的引诱，她断然地离开了她的市侩丈夫，她不信教，不崇拜金钱，她不虚伪，更不欺骗。正由于这样，在这个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她被看作是个“冷酷无情”的“尼姑”，“没有幽默感”，甚至被指骂为是“共产主义的妖妇”。当然，比之过去，伯尔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是一种进步。但尽管如此，卡特琳娜却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伯尔笔下的“小人物”。固然，在她身上出现了反抗精神，她甚至冷静地使用了暴力，开枪打死了人，但她的复仇纯粹是由于她所受到的迫害，出于个人动机，同时也只施加于个人身上，并不是由于思想上的觉悟，面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她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劳动者，她的生活信条是深信凭她的双手劳动以及她的

道德品质，她可以过安静的生活，她可以获得自己的私人住宅，可以找一个真正合意的丈夫。可是，《日报》对她的种种诽谤，不但使她的梦想成了泡影，甚至促使了她母亲的死亡。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日报》的行径是对她人格上的极大侮辱，于是最后终于使她断然开枪打死了这个在她看来是罪魁祸首的记者托特格斯。她始终不能意识到，她的真正敌人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她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抱有幻想的，因而当她被捕入狱后，她还在向往将来出狱后，用积蓄的钱跟她心爱的人一起开设饭馆，过太平日子。因此，尽管伯尔在这本书中对当代西德社会的揭露是比较深刻的，笔力是辛辣的，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形象却不过是一个稍具反抗精神的“小人物”而已。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伯尔的艺术风格，它还可以使我们了解当代西德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并有助于我们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和倾向。

1976年12月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末，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



下面的报道有三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次要来源。关于这些来源，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多作解释了。这三个主要来源是：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律师胡贝特·布洛纳博士；以及他的同学，检察官彼得·哈赫。这位哈赫显然私下补充了法庭的审讯记录，对调查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作了说明，还补充了一些没有写进记录里的讨论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结果；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公众，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的朋友布洛纳的苦恼深深打动了，这位布洛纳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法解释，虽然，后来他认识到：“如果我对这事件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么不但不是不可解释，甚至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案件由于被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她的保护人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因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份，从而也许会出现某些细小的，但却是合乎情理的毛病，就象哈赫所犯的那样，有

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至于那些次要的来源，有的有一些意思，有的则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从报道中出现的那些关系，纠纷，偏见以及苦恼和供词本身，就可以把它们弄清楚，因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

由于在这里谈的是关于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以一种“流水式”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品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替代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做“疏通”），凡是小孩子（或者成人）玩过积水坑游戏的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用小沟使它们彼此打通。先是把这些泥水塘沟通，使积水转移方向，让水流出去，直到最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地，按规定，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再不然就把它引向一条河道。这里所从事的就是“疏导”或叫做“排乾”的工作，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

动”的情况，请读者原谅，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因为难免也会出现淤塞，淤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有“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三

我们要在这里开始报道的事实，讲起来可能有些残忍：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妇女圣灰礼仪日^①的前夕。在某个城市里，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女在傍晚六点三刻的时候离家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

四天后，经过一个戏剧性的——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词汇表达（这里出现了必要的水位差，这种差距使水得以流动。）——发展过程后，在星期日的晚上，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确切地说在七点零四分的时候——这位年轻妇女来按刑事组组长霍尔特尔·默丁的门铃。这位默丁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正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酋长。这位妇女向这位惊骇的刑事组长供述，她在中午将近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

^① 妇女圣灰礼仪日，耶稣复活节前四十天斋期的第一天。

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她请默丁去把她的住所打开，并把死者弄走。她还报告说：她自己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再者，她还请求把她逮捕，她愿意到她的“亲爱的路德维希”那里去。

默丁曾经参加过对勃罗姆的几次审讯，他认识她，并对她抱有一定的同情，对她的报告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用他的私人汽车把她带到警察局，让她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然后立即通知了他的上司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一刻钟后，在勃罗姆的住所门前他们会合在一起，由一帮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了住所的门，于是这位年轻妇女的报告立刻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要尽量避免水流不通的地方，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谈有关“流血”的问题，这在电视里，电影镜头上，在恐怖影片和小歌剧里是经常碰到的：如果有什么应该在这里流动的话，那并不是“血”本身。应该讲的也许是有关色彩的效果问题：这位被枪杀的托特格斯穿着一身临时做成的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许多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象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象排水还不如说更象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好吧，总之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四

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也在圣灰礼仪日期间，在这个正在欢度节日的城市的西郊树林里，被人开枪打死了。他会不会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呢？有一段时间，这种猜测被认为并不是不可能，但后来当人们把时间的次序弄清楚后，就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确切”的了。后来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报告说，他曾经把这个也是装扮成酋长模样的舍纳和一个化装成安达卢西亚^①女人的年轻妇女开到一个树丛去过。不过托特格斯在星期日中午就被杀死了，而舍纳却是在星期二中午才被枪杀。尽管人们不久就发现，用来枪杀托特格斯的手枪跟杀死舍纳的手枪并不是同一支手枪，但仍然有一段时间怀疑也是勃罗姆干的，因为这涉及到动机的问题。如果她有理由在托特格斯身上报复，那么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可以在舍纳身上复仇。不过调查机关认为，勃罗姆同时有两支手枪是不大可能的。勃罗姆在进行谋杀时显得冷静而机灵；而当有人问她，是否也是她把舍纳杀死的时候，她以一种可疑的、反问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好啊！为什么不也杀死这个人呢？”但是一旦证实舍纳被杀时她确实不在场，这

^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包括八个省。

种嫌疑也就被取消了。而且，谁若是认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人，或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毫不怀疑：要是果真是她杀死舍纳的话，她就一定会直率地承认的。再说那个把这一对情人用汽车开到丛林去的（他说：“我倒不如说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丛更恰当些。”）司机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勃罗姆。“我的上帝啊！”他说，“这些身高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年纪二十四到二十七岁的漂亮苗条的女顾客在这狂欢的节日里有好几十万在这里跑来跑去呢。”

在舍纳的住所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勃罗姆有关的痕迹。没有一点关于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线索。舍纳的同事和认识的人只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前后他从新闻记者聚会的酒店出来，“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

五

有一位高级的狂欢节日的组织者，是一个酒商，香槟酒大王——他可以自夸，是他重新鼓起了欢乐——他很欣慰地表示说：亏得这两件凶杀案在星期一和星期三才公布。“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狂欢节前，那么欢乐的情绪和买卖就会全部完蛋。如果人们发现，利用化装可以犯罪，

那么马上就会失去兴趣，买卖随着也就告吹。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圣。放纵和欢乐需要信仰，这是它们的基础。”

六

自从这两件谋杀案在记者中间传开后，《日报》采取了很不平常的态度。简直象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它采用头号标题，出号外，用异乎寻常的篇幅登载讣告。仿佛这个世界上如果发生枪杀事件的话，死掉一个新闻记者是件很特殊的事情，要比谋杀一个银行经理，一个职员或者一个匪徒都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闻界的这种过份渲染，我们应该重视。因为不只是这份《日报》，别的报纸也都把谋杀一个新闻记者看作是一件特别恶劣的罪行，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近乎带有肃穆的性质，甚至认为具有宗教仪典的意义。有人竟然把它说成是“职业的牺牲”，《日报》甚至还坚持认为舍纳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虽然我们得承认，假使托特格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什么鞋匠或面包师之类的人物）的话，那他大概不致于被人杀死，可是我们应该试着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我们最好还是说，他的牺牲是由于他的职业所引起的呢。倒是对这个问题，

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象勃罗姆那样聪明而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是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七

现在让我们从最低的水位马上再回到高一点的水位上来。不再去管什么流血，让我们丢开新闻界的那种扰乱吧！反正在这期间，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住所已被打扫干净，不能再用的地毯扔到了垃圾堆里，家具也刷洗干净安置妥当，这一切都是由布洛纳博士经手花钱办理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担任她财产的监护人，但是他通过他的朋友哈赫，获得了这样做的权利。

那么在五年之内，这位卡塔琳娜·勃罗姆怎么会有这样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的呢？正如她的坐过监狱的哥哥所说：“这倒是笔牢靠的财产。”可是谁来缴纳这笔利息和还未付清的分期付款的四万马克呢？尽管房价有所上涨。勃罗姆不只有资产，同时却负着债。

托特格斯早已被埋葬（正如有些人所说，这次葬礼非常奢侈浪费）。舍纳的死亡及埋葬，就没有那样铺张，也